

类号 _____

为什么没有正确一海洋观

()

编印单位 _____

材料时间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军事学院图书资料馆

一九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书 号	

研 究 报 告

为什么没有正确的海洋观

研究员 吕胜祖

海 军 军 事 学 术 研 究 所

一九八八年一月

为什么没有正确的海洋观

研究员 吕胜祖

海洋观，广义来说就是海洋意识。它是人们对于海洋的主观映象，人们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同海洋发生联系，才会产生海洋意识。但是人们的海洋意识并不一定是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海洋观，对开发利用海洋、发展社会经济能起巨大的促进作用。没有正确的海洋观，就不可能很好地开发利用海洋，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必然起到阻碍作用。

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又是一个濒海大国。我国东南方向面临的称之为中国海的这一海区相当辽阔，海岸线漫长，岛屿众多，连接大洋，国内外的海上交通便利，蕴藏着丰富的海上资源。海洋对于我国人民的繁衍生息有着重大的贡献。因而，我们中华民族是最早具有海洋观的民族之一，是最早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是最早发明了指南针并运用于航海的民族，又是通过海洋而至今侨居海外人数最多的民族。明初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曾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即明朝中期以后几百年间，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没有正确的海洋观，只见陆地不见海洋，既不重视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又不重视海洋的防御与捍卫，致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被帝国主义首先从海上打开门户而曾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唯一大国。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为什么没有正确的海洋观，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海洋观可能不无裨益。为此，本文拟就经济、文化与政治等三个方面，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自给自足的经济

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农民分散地生活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农村中，村庄、集镇和城市互相隔离，社会经济生活是在一个很小的地域里进行着简单的循环，没有和周围广阔世界进行频繁联系的必要和可能。这种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必然在意识形态上反映为轻视国际间的交往，亦必然轻视国际间的海外贸易。直到十八世纪末，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一封书信中还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从世界范围来看，进行海外贸易的航运活动是中世纪

末期的一项重要的大规模的经济活动，这是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工场手工业的广泛发展，随之而来贸易活动的发展，促成了世界市场的出现，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与贸易往来，特别是海上贸易活动亦就空前扩大了。当时中国正值明朝，虽然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亦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国封建社会当然亦有一些国际经济联系与海外贸易活动，但它受到自给自足经济的局限，没有国际间经济大循环的条件，就不可能有广泛而持续的国际往来与海上贸易，因而亦不可能有正确的海洋观。

在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当国家比较强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对周边国家也可以采取比较开放、比较友好的态度，国际交往与海上贸易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甚至是相当程度的发展。如汉、唐盛世，中外交往较多，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得以交流。在明初，曾经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郑和率领的庞大航海船队七次下西洋，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所至海域之广，在世界历史上是没

有先例的，曾把中国的海外联系与贸易活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被誉为“并汉、唐之盛而有之。”然而，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既是空前壮举，又是中国封建社会海外交往的绝响，从历史上看来似乎是突然而起，又突然而止。这并非偶然，这是由中国自给自足经济所决定的。郑和下西洋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矛盾运动的结果，不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代经济变动的产物。郑和下西洋并不是像后期西方航海那样为资本原始积累事业服务的，而是为永乐大帝的外交政策服务的。当时明朝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并不足以产生大规模航海活动的经济要求，永乐大帝明智的外交政策才促使了郑和下西洋。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受着自给自足经济的局限，虽然郑和下西洋取得了极大成功，却始终有人反对。在封建皇权个人决策的情况下，反对派意见一旦左右了皇帝，远航活动马上就会停止。正是在郑和奉命准备第七次下西洋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永乐大帝去世，明政府中反对郑和下西洋的一派立即占了上风，继位的明仁宗听从户部尚书夏原吉的建议，立即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

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由内府该库交收。…
…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明仁宗实录》卷
1. 上）因而郑和船队被封，全体下洋官兵被调往南京镇
守。直到公元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宣德五年，户部尚书
夏原吉去世，反对下西洋一派失去了台柱，而且五、六年
间明王朝在海外威望大为下降，明宣宗才决定再派郑和继
续第七次下西洋。而郑和以后明廷的海交政策又起了很大
变化，再加上国势之渐衰，社会矛盾之日趋尖锐，大规模
下西洋航海活动的历史条件已不再具备，所以明中以后再
也未曾有过类似郑和下西洋那样的大规模航海活动。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必然阻碍着国际间的经济联系
和海外贸易，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使
强加外力，亦不能改变这个规律。例如在鸦片战争后英国
帝国主义者满以为能向中国大量倾销工业品，结果却是非常
失望。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对华贸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57页至61页）一文作
了十分精辟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过去有个时候，曾经
流行过一些十分虚妄的见解，说什么由于打开了天朝的大
门，美国和英国的商业一定会得以推进；当时我们曾根据

对本世纪开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精密考察指出，这些希望是没有可靠的根据的。”马克思在该文中摘引了1852年在广州的一名英国官员米契尔致乔治·文翰爵士的报告书中的几段文字来加以说明。米契尔在报告中说：“我们与这个国家（中国）的商约（注：指鸦片战争后英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充分生效，至今（1852年）已将近十年，每一个可能设想的障碍都已清除，一千英里长的新海岸已对我们开放，新的商埠已经直接在生产地区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就我们所预期的对我国工业品的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论，其结果又怎样呢？”“从贸易部的表报上，我们看到一件彰明昭著的事实，即在1850年底，我们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与1844年年底比较起来，几乎少了75万英镑。”中国“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农民不单是一个农民，他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他们生产这样的布疋，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勤于家庭劳动的人就去从事他的副业，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供应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从而，马

克思再次申明了他的科学论断：“除了鸦片贸易以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二、无求于人的文化

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容易造成文化上的固步自封与无求于人。因为经济上的封闭性，必然在文化上有所反映，使文化领域亦带有一定的封闭性。虽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相当发达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文化曾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四大发明曾经被世界崇敬，曾经对世界的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而且，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与中期，中国文化就有着一定的开放性，中国的伟大发明逐渐传到国外，中国社会亦曾兼容并蓄了域外传入的很多好东西，就连中华民族本身也是由秦汉以来各民族在相互的文化交流中融为一体的。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明中以后尤其清朝，封建统治制度的日趋没落，社会生产力长期的停滞，人民思想的长期被禁锢，使中国文化的封闭性倾向愈益突出起来。封建统治者只要求人民安分守己顺受统治，不允许人民觉醒而前进，采取愚民措施，提倡保守习气，盲目鼓吹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排

斥世界上先进的文化，认为中国的文化根本无求于人。

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时，中国封建统治制度残酷统治下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还是文盲，连本国固有的文化都知之甚少，根本不可能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奢望。对于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来说，除了少数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要求更新中国固有文化吸取外国先进的文化外，绝大多数是昏庸无能，满足现状，狂妄自大地守着“天朝原无求于人”的信条，仍然认为在西洋文化面前，中国固有的文化还能治国平天下。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仇视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把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一概诬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直到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大学士倭仁在奏折中还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竭力反对科学技术上“奉夷人为师”。（《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

封建统治制度下在文化上的夜郎自大、无求于人，以及轻视甚至仇视科学技术，阻碍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亦阻碍了与海外的文化交流，扼杀了正确的海洋观。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因之对于海外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在是

知之极少。林则徐在奏稿中就曾指出，清朝文武“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清王朝根本不了解“夷情”，对当时世界各国地理位置“若迷路之子，指东谓西”，“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以为不过南洋诸夷之类”（《海国图志·英吉利国二》卷52）。甚至到鸦片战争失败之时，公元1842年（道光22年）道光皇帝还不知道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海国图志·英吉利国三》卷53）。作为鸦片战争一方的主脑、大清帝国的皇帝，对世界最基本的地理知识如此一无所知，竟昏庸到如此地步，当时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海洋意识就可见一斑了。

这种无求于人文化的思想非常顽固，即使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技术以富国强兵之时，清政府被迫搞了洋务运动之后，封建顽固派仍然百般阻挠。例如，1871年中国派遣了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出国学习，但顽固派激烈攻击为“用夷变夏”，结果

留美学生中途停学，全部撤回。1876年，英国人在上海修筑了中国土地上第一条30里长的吴淞铁路，清政府却以28万两白银高价购回后，撤毁扔弃在水里。1881年建成的从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最初由于顽固派反对用蒸汽机车牵引，只好用牲口拉着车厢在轨道上爬行。可见，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由于无求于人文化的思想十分顽固，想要开展海内外文化交流，吸取西方先进的文化、技术，以及树立正确的海洋观，亦是不可能的。

三、闭关锁国的政策

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与无求于人的文化，阻碍着中国国际交往与海外贸易的发展，这种经济与文化必然会反映到政治上，成为产生闭关锁国政策的经济与文化基础。既然经济、文化是封闭型的，政治上当然亦可以是封闭型的。而且闭关锁国政策，又保护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与无求于人的文化，更加阻碍了国际经济交往与海外贸易。

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政策，特别表现在厉行海禁上，对扼杀正确的海洋观更为直接更为严重。这是因为明清厉行闭关锁国政策，除了经济、文化原因外，还有其维持封建

王朝统治的重要政治原因。

建立明王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曾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消灭了东南沿海的张士诚、方国珍两股海上实力，张、方的残余势力多数逃往沿海岛屿和海外邻邦，当时倭患又比较严重，明王朝为了防止海内外反明势力危及皇权统治，除加强海防以外再三厉行海禁。把当时的海外贸易控制在不影响明帝国安全的范围内，海外贸易只能由国家出面经营，对私人的海上贸易一概加以严禁。

清朝统治集团是满贵族集团，依靠血腥的烧杀建立了清王朝，凭藉满族少数的人口，残酷地统治着先进的、人口众多的、斗争传统丰富的汉族及国内其他各族人民，所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很突出，人民反清斗争始终未曾停歇，而这种反清斗争以东南沿海为最盛。清军入关以后，看到经济比较发达，市民阶级力量较大的华东、华南沿海沿江地区，正是反清的中心地区和最坚决的地区。沿海的市民阶级直接间接地支持了、参加了直至领导了反清斗争，而且不仅常和海上的武装商队相联结，还常和海外华侨相联结，还受到欧洲市民阶级的思想影响，成为清王朝难于对付的一种敌对势力和敌对武装。所以，清王朝为

了维护其野蛮统治，不仅要阻止国内市民阶级经济的发展，遏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更要截断国内和华侨的联结，截断沿海人民和海上武装商队以及海岛武装的联结；还特别要截断人民和欧洲市民阶级的接触。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页至8页）一文中指出的“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闭关锁国）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

清王朝的海禁比历代都严厉。清王朝不仅宣布汉人出洋是“自弃王化”，即视为“化外之民”，而且不论官民一律杀头并没收其货物及全部家产，连带地方保甲也一律处死，文武官员失察则免职治罪；甚至宣布永禁华侨回国，取消他们的国籍；对沿海的封锁采取极为严密的措施与部署。虽然有时也曾开放过海禁，但往往为时不久又禁，而且越到后来，禁令越是烦琐，越是严密。清王朝的这种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使中

国成了民族的牢狱。其结果只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和崩溃。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的那样：“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必然要解体一样。”

为什么没有正确的海洋观？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无求与人的文化以及闭关自守的政策。这是中国明中以后几百年间只见陆地、不见海洋，海洋方向产生一系列悲剧之所在。尽管中华民族很多有识之士以及沿海广大人民，曾以强烈的海洋观与封建统治者的海禁、闭关政策作过不断斗争，努力开发与利用海洋，百折不挠地捍卫海洋权益，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局面才得到了根本改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的海洋意识有了空前的增强，海洋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然而，民族传统有其继承性，好的传统能得到继承与发扬，一些不好的传统却亦可能在某些时间、某些条件下影响某些人。所谓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由于历史的传统有其“可

传”的因素。我们建国以来，旧中国的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影响，曾经对海洋事业的发展、海洋意识的增强产生一些消极的作用。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例如：自然经济以及半自然经济，客观上限制着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到与国际间的海上贸易的发展；解放初期美蒋对我大陆沿海的封锁，曾在客观上阻挠了我之国际海上往来；政治运动中的“左”的做法，往往把“海外关系”视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有时成为“里通外国”的嫌疑，甚至令人谈虎色变；为了破除民族自卑感，有时不适当地贬低国外的先进技术与文化，片面夸大我国文化技术的优越性；有时片面强调“自力更生”，使之成为“闭关自守”的代词，成为反对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遁词等等。特别是十年动乱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闭关自守、锁国愚民的政策，对先进的科学文化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给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正确主张扣上“卖国主义”、“洋奴哲学”的帽子，更是严重地阻碍我国正常的国际交往，在世界上六、七十年代科技、经济迅速发展之时，自我封闭状态使我国远远落后于时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和发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提出了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等指导方针。赵紫阳同志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当代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得发展。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尤其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闭关自守只能越来越落后。”十三大的精神，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必将指引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海洋意识，确立正确的海洋观。